

# 梁启超国家主义转向的日本因素

## ——以加藤弘之为中心

张卫娣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洛阳471003)

**摘要:**加藤弘之所引介的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其中央集权性和权威主义倾向是促使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伯伦知理的学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共性,这一共性就是伯伦知理的有机体理论(有机体由内部向外部自然发展的力量)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进化力量的契合。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转向,是其通过对明治思想进行深入考量和对近代日本政治运营态势准确判断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和合理调适,深化了他对国家发展和未来建设的长远思考,是在更高维度上的探索,蕴含着其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深邃思考和缜密洞察。

**关键词:**近代;日本;梁启超;加藤弘之;国家主义;转向

**中图分类号:**K256.5;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5-0088-07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898年逃往日本,此后其政治观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原来主张实施民主共和的激进立场,转向温和、渐进的“文明专制”;从信奉卢梭的自由主义,转向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国家主义”。梁启超为何转向,如何看待这一转向,十分耐人寻味。

居日14年(1898-1912)的修炼,铸造了一个多元而矛盾的梁启超。学界从政治学、史学、文化学、文学等多种视角对其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对其政治思想与日本的关联性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其国家主义转向与旅居日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学界普遍认可梁启超思想的转向是在鉴取了日本思想家思想的基础上发生的,但对于其究竟鉴取了什么、如何鉴取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论及;大多学者只注重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对日译西学的吸收,忽视了其政治观转向与其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解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特别是忽视了国家主义学者加藤弘之的转向对梁启超的影响。关于梁启超政治观转向的实质等问题,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的转向是突变,甚至“变得是那样的迅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

感”;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通过日本媒质这一“跨语境实践”摄取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时,由于常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进行“隐蔽和挪用”,从而曲解了伯伦知理的学说<sup>[1]</sup>。在此,拟以梁启超政治观转向为经,以与加藤弘之转向的关联性为纬,对上述认识作一梳理和澄清。

###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思想态势

(一)政治态势:确立了天皇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政治改革跌宕起伏。明治初年,推翻了腐朽的幕藩体制而走上政治舞台的明治新政府,雄心勃勃,向世人宣布实行立宪政治、导入议会制度的构想。但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与明治政府所设定的国家架构以及实现这一架构的步骤不一致,这是明治政府所不能的。特别是自由民权运动向上下两个方向的渗透——上层出现了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势力,下层呈现出与农民武装斗争相结合的苗头,更加令明治政府不安。于是,以“明治十四年政变”为契机,明治政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越发走向保守。

收稿日期:2015-04-22

作者简介:张卫娣,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同时,明治政府还敏锐地捕捉到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幻——从抽象的自然法思想向历史法学(历史主义)转换这一社会思潮的演变,了解到了比自然法思想更为先进的欧洲最前沿的政治思想。在他们看来,自由民权派所依据的思想主要是源于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这些思想大多是反对现行体制的在野思想,倡导激进主义。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这些理论日趋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时的德国,曾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想主义哲学也被从“王座”上拉了下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

在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下制定的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过程,是普鲁士·德意志(以下简称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兴盛的过程,也是明治思想从激进走向渐进和保守的过程。通过明治宪法体制的制定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加藤弘之所引介的社会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论是构建明治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明治宪法制定后的国家政体是建立在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倾向的超然政体。制宪模式从英法模式转向德国模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从民主主义转向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权力机构的建立,其实质就是为了建立强大的政权机制,以顺利地推进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加藤弘之的转向正体现了明治政府这一政治态势的演进脉络,这一政治脉络也深深影响了身处日本的梁启超,这是构成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环境因素。

## (二)思想态势:“天赋人权”向“天赋国权”回归

随着日本政治态势的变换,思想界也出现思想变异。明治政府将立宪理念锁定为德国国家主义后,明治初年译介到日本的边沁、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思想、卢梭的自由主义人权说等西方思想,陆续遭到排斥。日本启蒙思想家也先后转向,把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启蒙思想“天赋人权”变异为“天赋国权”,并进而转向了极端国家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在如何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权利义务关系上,日本启蒙思想家坚持国权优先的立场,认为个人的自由权利必须由国家加以保护和劝导,个人必须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尽力。就连“启蒙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也转向了国权主义甚至拥护军国主义的立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弱肉强食观,他把个人的自由延伸为

国家的自由,把“天赋人权”异化为“天赋国权”,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为国家的富强尽力,指出:“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sup>[2]30</sup>。

在当时的思想界,很多启蒙思想家也都开始向国权思想转化,坚持国权优于民权。小野梓强调个人的权力要服从国家权力,认为过分强调“天性上的权利自由”即个人的权力,只会扰乱国家“交际上的权利自由”。矢野文雄认为,自然的自由要受到“公共道理”的制约,“单独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就连最彻底的民权论者植木枝盛,也强调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自由,指出:“国家安危与每一个人的安危息息相关,一国若安,个人亦安;一国若危,个人亦危”<sup>[3]53</sup>。可以看出,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单独利益”,而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观念,所主张的不是伸张个人的自由,而是如何与国家权力保持一致,服从国家的自由。因此,他们在现实中对明治政府专制体制的建立采取了妥协的立场。

“明治十四年政变”(1881)后,很多启蒙思想家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加藤弘之彻底与天赋人权思想决裂,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81年写的《时事小言》中,福泽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主张振兴国权。此后,他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观奉为圭臬,鼓吹“脱亚入欧”论调,成为鼓吹与欧洲列强一道欺凌亚洲邻国的扩张主义思想的急先锋。他不相信“国际公法”,信奉“弱肉强食”,指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sup>[4]37, 636</sup>。高山樗牛公开宣称日本“国民最有资格成为膨胀的国民”,露骨地宣扬帝国主义。

上述日本复杂多歧的政治态势和思想变异,给患难东渡的梁启超以巨大影响,是其思想“为之一变”的外在驱动力。

## 二、梁启超国家主义转向的“东学”背景

### (一)加藤弘之向国家主义的转向

以1881年为界,加藤弘之的思想经历了由服膺卢梭天赋人权说到服膺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转向过程。大概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张英法系统的天赋人权思想,信奉卢梭的自由主义,后期主张达尔文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说。

加藤于1861年完成了第一部介绍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著作——《邻草》,明治维新后又连续撰写

了天赋人权三部曲——《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继续介绍和传播天赋人权思想。他从天赋人权的立场举荐共和政体，认为它是“世上至高的光明美好的政体”，指出：“自从我读了西方法律和政治书籍后，信仰卢梭所主张的天赋人权思想，把人天生就是平等的、拥有相同的权利的学说，奉为真理”<sup>[10]488</sup>。但是，“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加藤转向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说。“转向”后，他要求把原来依据天赋人权思想而写成的三部曲毁版禁行，并于1882年适时地推出了《人权新说》，彻底与天赋人权思想决裂，转向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说。加藤弘之在该书中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一样，优胜劣败是常理，生存竞争不可避免。他给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注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有机体等新鲜理论，把日本带入了社会至上和国家主义的轨道。

加藤弘之“转向”的内涵有二，其一是用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来对抗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他在批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指出：“我欲用与物理学有关的进化主义来驳斥天赋人权主义，用进化主义驳斥天赋人权主义。”<sup>[11]416</sup>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进化主义”用于分析、解释国家和社会，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自然法则，指出：“我们的遗传和变化的优劣等差，既然长久不灭，永无尽期，那么，由这个优劣等差所生的竞争胜败，也就可以保有其长久不灭，永无尽期。由此观之，我们人类既各有其优劣等差，因而也就发生无数的优胜劣败的作用，这实在是万物法的一大定规，永久不变不易的原理”<sup>[11]436-437</sup>。他崇信进化主义，把人权、自由、正义、人道等伦理概念贬诬为可笑的妄想。

其二是主张国家权力对于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加藤认为，个人权利须限控在国家统治者的利害范围之内，国家不能离开个人的权利而独立，个人的权利也不能离开国家而单独产生。他指出：“国家与我们的权利，可以说是专制者为了全体及每一个人的安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始设定的。”<sup>[11]445</sup>他认定自由须依附于国家权力，人民的权利受制于强者的权力。

加藤弘之是明治时期影响力很大的官僚学者，其主要政治理念成为了明治政府的施政基础。为了配合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体制，加藤有意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

进行曲解，有意淡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内容，故意夸大国家至上的一面。作为御用教师在给明治天皇讲授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时，加藤加大了国家有机体论中的以君主主权为中心的绝对主义的比重，极力强调近代君主立宪体制的作用和地位，故意凸显超越国民个体、主权在君的国家主权思想。

## （二）梁启超对加藤弘之的亲近

梁启超抵达日本的这一年是明治31（1898）年，日本已经完成了以加藤所引介的社会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步入了“扬国威于四方”、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样一个复杂多歧的日本，正好给梁启超提供了吸收多元化思想的平台。在日本，他不仅结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品川弥二郎、矢野文雄等许多日本社会名流，还借助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广泛涉猎了卢梭、边沁、伯伦知理等许多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直接吸收了其中的思想养料，眼界为此大开。他自己曾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sup>[5]186</sup>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说：“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sup>[6]81</sup>

在日本思想家中，给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福泽的思想已成明日黄花，被归入“天保的老人”们之列<sup>[7]12</sup>。所以，在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给梁启超以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家是加藤弘之。梁启超参阅的加藤论著有《強者の権利の競争》《天則百話》《道德法律進化の理》等。梁启超将加藤的《天則百話》的部分译文刊载于《民报》，在译文的开头处介绍道：“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余夙爱读其书”<sup>[8]2308-2309</sup>。他通过解读加藤弘之的《強者の権利の競争》，加深了对社会进化论以及功利主义的理解。在借鉴了加藤的《強者の権利の競争》而撰写的《论强权》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解析了“强权”的来历及意义，指出：“何云乎强者之权利？谓强者对于弱者而所施之权力也。自吾辈人类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无机物世界，皆此强权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无所谓权利，只有权力而已，权力即利也。”<sup>[9]2268</sup>“强权”一词，是他将加藤的“强者之权利”



进行了缩译,是他自己创造的汉语词汇。显然,梁启超从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得到“强权”这个概念的灵感,并认定国家间的竞争是“权利的竞争”。将国际关系中所有一切归结为权力,这一结构图式对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说,最能简洁明快地表示国际政治的严酷性。从此以后,他经常用“强权”一词作为政论的关键词,认为为奋发中国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梁启超借鉴加藤理论的其他论著中,也可以看出其所倾注心力的地方。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他对加藤的《道德法律進化の理》一文中关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利他只不过是利己的一个手段,通过利己就可利他,乃至利群。这是以利己为标准的功利主义观点。在将加藤的《天則百話》的部分译文刊载于《民报》时,他对材料的选择也是耐人寻味的。他择译的是“实学空理之辨”(原话一)、“自由研究”(原话十三)、“我輩九百九十年前之祖宗”(原话十四)和“利己心之三種”(原话九十四)四部分。从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其所关心之所在。

总之,如饥似渴地探索救亡图存真理的梁启超,察觉到日本国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加藤弘之所引介的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基础之上的,并对其中的中央集权性和权威主义倾向备加关注。

### (三)梁启超对加藤弘之政治观的鉴取

旅居日本后,梁启超将日夕熏染和实际体验的日本经历,融铸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他积极鉴取加藤弘之的德国国家主义观,将伯伦知理的国家至上主义思想奉为圭臬。

伯伦知理是19世纪德国国家有机体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国家学说经加藤弘之等人的大肆宣扬,成为日本建构天皇制资本主义的学理依据。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了伯伦知理撰写的《为文化人的德国国家学说》(吾妻兵治译),并深层次地了解了国家有机体理论,在其影响下于1903年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从此,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成为梁启超建构其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使他从机械论的民主革命立场转到了有机体论的改良路线。

同加藤弘之一样,梁启超信奉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后,首先套用伯伦知理的理论,驳斥共和政体的弊端。梁启超批判主权在民学说,认为如果运用卢梭的民约论学说,可能造成滥用自由和平等观念、无法巩固社团组织等各种弊端。梁启超还认识

到,共和制度存在着不能对文化生活进行实质性改进、歧视下层人民以及最终会导致平民专制等种种弊端,共和制虽可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但由于其是以善变的民意为基础,所以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通过1903年对美国的考察,梁启超看到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许多弊端,这使他对民主制度更感失望,对其开始动摇和怀疑。他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反思道:“吾醉心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sup>[12]85</sup>。因此,梁启超的结论是:卢梭的民约论不适用于散漫无纪的中国。

其次,信奉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国家主义的有机体和人格国家主权为理论根据,以国家主权取代主权在民学说,主张国家至上主义。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确实如同生命的生长过程,其意志、性格、人格、目标、能力等因素都在这个生长过程中表现出来;在这个有机体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中,人为的突变只能造成灾难,只有顺其自然的渐进,才能使这个有机体的生命顺利成长。他模仿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学说,在政府和人民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国家,把国家作为统领政府和人民的最高存在<sup>[13]881</sup>。国家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他指出:“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sup>[14]218</sup>在他看来,当国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以保护国家利益,指出:“以国家自身为目的,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sup>[15]22</sup>。可见,在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天平上,国家利益明显重于国民利益。他把团体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认为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的自由,把一切都着眼于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利益,认为不论政府如何行使权力,只要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这一目的,就应该鼓励。因此,梁启超提倡“强有力之政府”论,认可“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的发展趋势。

梁启超从加藤那里了解到了伯伦知理有关国家主权以及国家的本质和目的后,开始思索建立强

大民族国家的方略。正是在服膺伯伦知理的有限君主立宪制学说的基础上,梁启超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并最终形成了开明专制这一新的治国理念。

### 三、梁启超国家秩序重建的理念及模式选择

(一)梁启超国家秩序重建的理念——以有机之统一求有力之秩序

梁启超崇信“国家有机体”理论,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视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意义。

自1899年接触伯伦知理的理论后,梁启超就彻底认同并倾倒其“国家有机体”理论,并用伯伦知理的学说反击卢梭的民约论,认为卢梭是“十九世纪之母”,伯伦知理是“二十世纪之母”,认为卢梭的民约论已经不适合于20世纪的中国:“故从卢氏之说,仅足以立一会社,其会社亦不过一时之结集,变更无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续之国家,同心合德之公民,无有是处”<sup>[12]67-68</sup>。“国家有机体说”是以伯伦知理为代表的德国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所谓“国家有机体说”,就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法人格、具有独立意志品格和行为能力的有机体:“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他完全认同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认同国家是有“意志”、也有“行动”的“有机体”<sup>[16]1068</sup>。他自觉运用伯伦知理的“有机体”来强调个体要服务于国家利益,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统一和秩序优先于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强调国家至上,指出:“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sup>[17]114</sup>。梁启超用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理论总结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以及“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sup>[18]558</sup>。梁启超强调个人自由存在于团体自由之中,认为“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其所关心的权利是团体之权利,指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国民者,一私人之所结集也,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其民强者谓之国强,其民弱者谓之国弱。”<sup>[19]132</sup>总之,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有机之统一与有

力之秩序(即稳定的国家),所以他所看重的自由首先是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

梁启超认为,建构强有力政府是有力之秩序的保障。根据对日本明治政府的政治运营情况的解读,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指望通过民主政治来达到国家的富强,只能乞灵于集权政治,寄希望于一个强势领袖所领导的强有力中央政权,以及这一中央政权卓有成效的领导。梁启超尤其倚重内阁的行政权对国家的统治力,认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内阁,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梁启超所设定的最佳强有力政府建构途径是政党内阁制,其推崇的最佳政党内阁制的样板是英国,指出:“故在今世界中数强有力之政府,则未能有比英国者也。”<sup>[20]2501</sup>他以英国的政党内阁制为政权建构模式,拟通过国会的立法权和内阁的行政权的调和与协调,来创建一个能够领导中国走出困境的强有力政府。他指出:“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sup>[12]21</sup>他认为,弱者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争取权利。他说:“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权利何自起?起于胜而被择。胜何自起?起于竞而获优。”<sup>[21]37、104-105</sup>他强调弱者要同侵夺权利的强者竞争,要“求自存”、“求胜”,否则“弱者必愈弱,强者必愈强,而世终不可得平”<sup>[22]331</sup>。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进化论的,指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之所由起也。生存竞与天地而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sup>[23]23、32</sup>。梁启超在这里用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原理和法则来解释人类社会,指出:“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sup>[12]118</sup>。他欲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规律来诠释中国的现实,以引起世人的警觉,起到振聋发聩、催人奋发的作用。可以看出,他所苦心孤诣的是欲通过“不优则劣,不存则亡”的道理,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发奋图强。

可以看出,梁所崇信的“国家至上”国家主义观,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一种强调“民族觉悟”“民族精神”“民族至上”和追求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国家观,其出发点在于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形成近代国家观念。



## (二)国家秩序重建的路径

深受加藤渐进政治论的影响,梁启超也主张政治革新必须走渐进改良之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所以必须“先藉君权以转移之”<sup>[24]42</sup>。他认为,民德、民智、民力是一国政治、学术和技艺的本原,若民智不开就设立议院,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

居日期间,梁启超了解到日本的立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指出:“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同异,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sup>[25]5-7</sup>。正是他看到日本是“民智稍开”后才完成立宪政体的,因此他主张中国也效仿仿日本,戒急勿躁,认为“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才能实行立宪制。1903年自北美返回日本后,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主张应以“开明专制”作为当前中国的治国之策。他把专制政体分为野蛮专制和开明专制两种,“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的是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的是开明专制<sup>[26]22</sup>。在他看来,当前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因此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政体模式应是开明专制,指出:“故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sup>[26]34</sup>。他批判“效日本速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认为“日本以四十年之学力,遂有今日”的原因是开明专制,指出:“彼盖由纯粹的开明专制,渐移于变相的开明专制也……使日本不用开明专制,而于颠覆幕府后即行共和政治,而谓其能有今日乎?必不能矣”<sup>[26]17、71</sup>。

梁启超是一个温和改良派,其最终政治目标是实现立宪政治。梁启超认为,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中,君主立宪政体是国家政权重塑和社会秩序整合的最佳路径。他认为专制政体弊端很多,指出:“专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则乱,即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至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同时,他也指出了民主立宪政体的很多缺陷:“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sup>[27]405</sup>因此,他认为,比较而言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政体之最良者也”,长处很多,指出:“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

之”,“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sup>[27]406</sup>因此,梁启超最后得出立宪政体是“永绝乱萌之政体”的结论。

可以看出,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国家利益,政治价值取向是以国家为最高存在。但是,它是权宜之计,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形式,其目的在于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与普遍主义价值,中和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学理学说,并非将其作为一种特殊主义的价值永远固化下来。因此,他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以立宪为前提,在保持政权稳固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渐进改良,通过渐进的民主进程,推行国家民族思想,实现国家的振兴和富强。

## 四、结语

日本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促使其政治观转向国家主义的机缘,是他在日期间对日本近代政治生态的把握和政治思想的解读。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由于“广搜日本书读之”,所以“脑质为之改易”。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成型于1903年赴美考察之前,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定的赴美之后。正如张灏所指出的那样,梁启超对民主制度的排斥和对政治权威主义的倾心,决不能简单认定是由于他考察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态势后的一个思想突变,而是“明治日本国家显著增长同时出现的明治寡头政府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的强烈倾向”,“即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到突出19世纪德国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sup>[28]173</sup>。日本这一政治生态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转向,蕴含着他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深邃思考和缜密洞察,是他通过对明治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深入考量、咀嚼和对近代日本政治运营态势准确判断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和合理调适。梁启超国家主义的回归,深化了他对中国国家发展和未来建设的长远思考,是在更高维度上作出的探索。因此,尽管梁启超的思想多变,甚至前后时有矛盾,但他对进化主义的信奉,是其基本不变的主调。梁启超从伯伦知理的学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共通性,即前者有机体理论中的有机体内部自然向外部发展的自发力量与后者所提倡

的“优胜劣汰”的进化力量之间有着相通性。他试图通过这种相通性,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以达到建设一个强盛国家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梁才主张“强力政府论”的。梁启超认为,鉴于国民的开化程度,若将民权交与缺乏法纪意识的国民,不仅会使民权落空,还将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强有力之政府”也好,“开明专制”也罢,都是其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而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其针对中国的特殊时期所做的一种过渡性安排,是权宜之计,而非其最终的与民主政治价值高度吻合的制度选择。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看,这一主张有其历史必然性,应理性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

虽然梁启超是受到加藤弘之的深刻影响才开始国家主义转向的,但他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体现了其主体性和目的性。如梁启超在撰写《论强权》一文时借鉴了加藤的《強者の權利の競争》,吸收进化论思潮时欣赏加藤的国家主义和强权思想,但那是在注重历史发展观、历史革新的前提下,为了把积弱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国家,才强调国家至上,注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为注重竞争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他还注意到日本由于过于崇信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奉为至高无上,才走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是他极力避免的。另外,他认识到了日本明治宪法的实质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认为其中“万世一系”、天皇绝对君权等有关国体的规定,是“欧美无有”、“日本陋儒”发明的“陈词滥调”,并警告清政府立宪时“当尽采世界之所长”,不“必专师日本”<sup>[29]</sup>。

(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 参考文献:

- [1]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J].政法论坛,2004(6).
- [2]福泽谕吉著作集:第3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9.
- [3][日]家永三郎.植木枝盛選集[M].东京:岩波書店,1974.
- [4][日]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M]//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書店,1969.
- [5]梁启超.夏威夷游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M]//林志钧.饮冰室合

集:文集之四.上海:中华书局,1963.

[7]区建英.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8]梁启超.加藤博士《天则百话》[M]//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饮冰室文集点校4.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9]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M]//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饮冰室文集点校4.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0][日]加藤弘之.国体新论[M]//植手通有:日本名著34:西周·加藤弘之.日本:中央公論社,1988.

[11][日]加藤弘之.人权新说[M]//植手通有:日本名著34:西周·加藤弘之.日本:中央公論社,1988.

[1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4]梁启超.论国家思想[M]//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M]//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9]梁启超.新民说[M]//张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

[20]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M]//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1]梁启超.新民说[M]//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M]//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3]梁启超.自由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李兴华,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7]梁启超.立宪法议[M]//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8]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29]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 周 峰]